

任宜敏

著

中國 佛教 史

清代

人民
出版
社

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

中國
佛
教
史

清代

任宜敏
著

● 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郇中建

装帧设计:曹 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佛教史. 清代/任宜敏 著. 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5.5

ISBN 978-7-01-014330-9

I. ①中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佛教史-中国-清代 IV. ①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4265 号

中国佛教史 清代

ZHONGGUO FOJIAOSHI QINGDAI

任宜敏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27.5

字数:64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4330-9 定价:9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目 录

(1)	第一章 导论
(1)	一、佛教政策
(64)	二、僧官制度
(70)	三、刻经与著述
(84)	四、教界态势
(95)	第二章 临济法脉:天童系
(104)	一、五峰如学灯系
(108)	二、朝宗通忍灯系
(110)	三、石车通乘灯系
(116)	四、石奇通云灯系
(126)	五、牧云通门灯系
(137)	六、万如通微灯系
(153)	七、浮石通贤灯系

- (170) 八、木陈道忞灯系
 (195) 九、林野通奇灯系
 (219) 十、费隐通容灯系
 (252) 十一、汉月法藏灯系
 (287) 十二、破山海明灯系

(318) 第三章 临济法脉:磬山系

- (321) 一、印中通授灯系
 (323) 二、林皋本豫灯系
 (325) 三、山茨通际灯系
 (330) 四、箬庵通问灯系
 (396) 五、玉林通琇灯系

(446) 第四章 曹洞叶裔

- (447) 一、云门系

(489) 二、寿昌系

(533) **第五章 教行师范**

(535) 一、贤首宗

(558) 二、净土宗

(576) 三、律宗

(602) **第六章 藏传佛教**

(602) 一、格鲁派

(649) 二、萨迦派

(663) 三、噶举派

(670) 四、宁玛派

(681) **第七章 辅教居士**

(682) 一、周梦颜

- (692) 二、彭绍升
 (703) 三、杨文会
 (713) 四、余别朝贤时
 彦之俊选

- (731) 清代佛教大事记
 (786) 主要参考文献
 (794) 人名索引
 (848) 主题索引
 (852) 清代临济宗天童系法脉传承
 简表

(863) 清代临济宗磬山系法脉传承
简表

(867) 清代曹洞宗法脉传承
简表

第一章 导 论

清代佛教,主要指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·福临顺治元年(1644年),至逊帝爱新觉罗·溥仪宣统三年(1911年),共268年间,佛教在全国范围承续衍变之史实。为更完整、更清晰地展示其发展背景、变迁脉络等情景,有时亦上溯至太祖高皇帝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、太宗文皇帝爱新觉罗·皇太极两朝之化迹因缘。

一、佛 教 政 策

清代立国之初,便确定崇儒尊孔,以儒家思想为帝王敷治之正统、修齐治平之指导,颂扬孔子为开万世文明、树百王仪范、德配天地、道贯古今、昭宣文治、垂宪万世之至圣先师。崇德初年(1636年),正式遣官致祭;其后诸帝,靡不临雍亲祭,竭诚尽敬;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·玄烨、高宗纯皇帝爱新觉罗·弘历,更数数躬诣山东曲阜,释奠庙堂,展三跪九叩之文,行读祝跪献之礼,隆重祭祀;

钦定孔子之名为圣讳,规定除四书五经外,“丘”字一律改用“邱”字,以示尊崇至圣先师;复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为肇圣王、裕圣王、诒圣王、昌圣王、启圣王,设曲阜执事官,每年春秋致祭,以追溯前徽、肃将祀典;又封孔子第65世孙孔允植为衍圣公、兼太子太傅,以昭明德之报于无涯;自康熙至乾隆朝,三修曲阜阙里孔庙,顶易黄瓦,以昭诚敬致尊崇,并诏令全国各地修建孔庙,岁时致祭。自汉唐以降,议礼考文、崇儒敬师,未有如斯之盛!

康熙九年(1670年)十月,圣祖爱新觉罗·玄烨敕谕礼部,强调“至治之世,不以法令为亟,而以教化为先”,随后颁示《圣谕十六条》,即:敦孝悌以重人伦;笃宗族以昭雍睦;和乡党以息争讼;重农桑以足衣食;尚节俭以惜财用;隆学校以端士习;黜异端以崇正学;讲法律以儆愚顽;明礼让以厚风俗;务本业以定民志;训子弟以禁非为;息诬告以全良善;诫窝逃以免株连;完钱粮以省催科;联保甲以饷盗贼;解仇忿以重身命。进一步明确以儒家思想训迪、劝导、教化整个社会,从而达成“法古帝王,尚德缓刑,化民成俗”之目的^①。嗣又下诏举荐博学鸿儒,延访硕彦奇才。世宗爱新觉罗·胤禩继承大统后,为奉先至、启后人,专门详尽开释《圣谕十六条》,旁征远引,推衍文义,演绎成洋洋万言之《圣谕广训》颁行,使群黎百姓家喻户晓,冀借儒学权威,匡正社会风教,用除浮嚣陋习,渐臻民风醇厚、家室和谐等治平之境。仁宗爱新觉罗·颙琰,进以《圣谕广训》为依据,编撰成《四言韵文》颁行各省,以全面普及儒家思想。

与此同时,鉴于佛教传入中国数千百年,历代相因,百姓崇信,

^① 详见《清圣祖实录》卷34,康熙九年十月癸巳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10页。

荒服敬奉,原未可废,乃又在在保护之,令与儒道并垂,反复强调儒释道三教一致,殊途同归,强调神道设教,圣人所尚,与人为善,决非小补,故要求天下世人,屏去畛域,广大识见,明白三教并行不悖之理:“能仁之量,等于好生;佛道之成,关乎民隐。将使般若之门随方而启,仁寿之域举世咸登。”^①“佛氏之教,息心净业,以独善其身。而文殊所愿,在饶益众生。布施以广仁义,持戒以守信,忍辱以为谦,精进以施敬,禅定以守静,智慧以通理。”^②“粤稽三教之名,始于晋魏,后世拘泥崇儒之虚名,遂有意诋黜二氏,朕思老子与孔子同时,问礼之意,犹龙之褒,载在史册,非与孔子有异教也。佛生西域,先孔子数十年,倘使释迦、孔子接迹同方,自必交相敬礼。盖五典、九经、三物、六行、治天下之大纲小纪,固始自二帝三王,而集成于我至圣,然必解脱诸相,而后此心方能达万事万物之性理,此则其必然者。后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,谓某为日,谓某为月,谓某为星,朕意不必如此作拘拟之见,但于日月星之本同一光处,喻三教之异用而同体可也。”^③“朕以圣王之法治天下,而于法王之法蚤承先训,深契净因,故推演至义,为大众津筏。凡欲万善同归,永资福佑云尔。”^④实践之中,更常以佛教为辅佐,光扬道化,

- ① [清]爱新觉罗·玄烨:《重修天竺碑》,转引自周叔迦编撰,苏晋仁、程恭让整理:《清代佛教史料辑稿》,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2000年,第63页。
- ② [清]爱新觉罗·玄烨:《御制南台普济寺碑文》,转引自崔正森、王志超:《五台山碑文选注》,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1995年,第62页。
- ③ [清]爱新觉罗·胤禛:《御选语录》卷12《上谕附录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,第616页。
- ④ [清]爱新觉罗·弘历:《御制法雷寺碑文》,转引自崔正森、王志超:《五台山碑文选注》,第112页。

激发善心,阴赞皇贄,显资治理,祝厘国家,安定社会。

1. 清代诸帝与佛教

清代诸帝,大多崇信佛教,护持佛法。

开国之君、太祖高皇帝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,对佛教相当友善;虽然一生戎马倥偬、无役不与、勇武绝伦,仍不忘兴建寺院、颁行保护寺院政策,以支持佛教发展。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四月,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于宣布独立、自称金国汗前一年,在沈阳之东赫图阿拉城,创构三世佛寺及玉皇庙等,“凡七大庙,三年乃成。”^①天命六年(1621年)十一月三十日,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取得辽东不久,即颁谕旨,于兵荒马乱之中,竭力保护寺庙:“任何人不得拆毁庙宇,不得于庙院内栓系马牛,不得于庙院内便溺。有违此言,拆毁庙宇、栓系马牛者,见即执而罪之。”^②

太宗文皇帝爱新觉罗·皇太极,对佛教有深刻领悟,兴趣与好感,尤甚乃父。彼在位期间,后金与朱明王朝及蒙古、朝鲜之间,攻伐不断,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,然仍能一以贯之地尊重、保护僧人^③,护持寺院:天聪六年(1632年)四月,后金军队出征蒙古,皇太极敕令众将士:“勿毁庙宇,勿取庙中一切器皿,违者死!

① 《东华录·天命一》,转引自周叔迦编撰,苏晋仁、程恭让整理:《清代佛教史料辑稿》,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2000年,第1页。

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:《满文老档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年,第267页。

③ 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11辑,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,第2页;《清太宗实录》卷59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806—807页。

勿扰害庙内僧人,勿擅取其财物。仍开载僧众数目具报,若系窜匿庙中人口及隐寄牲畜,听尔等俘获。不许屯住庙中,违者治罪。”^①崇德元年(1636年)十一月征讨朝鲜,又谕诸将士:“今者往征朝鲜,……大军所过,不许毁拆寺庙。”^②崇德三年(1638年)八月,皇太极令多尔袞领兵往征朱明王朝,宣示军律,再次特别强调:“勿毁寺庙”^③。与此同时,于后金国内,积极保护古刹,兴修寺院:天聪三年(1629年)二月,遍视辽阳诸寺庙,“见玉皇庙殿宇圯坏,命重葺之。仍谕查出原毁之人,令其修复庙内屋舍”^④;天聪九年(1635年),敕令重修辽阳城西汉代古刹广祐寺^⑤;天聪八年(1634年),元裔察哈尔汉国墨尔根喇嘛賚嘛哈噶喇金身像至盛京,敬赠太宗爱新觉罗·皇太极,皇太极随即于殿侧建造银塔供奉,并神速建成嘛哈噶喇像楼;随后,又“命工部卜地建寺于城西三里许”,崇德元年(1636年)秋奠基,至崇德三年(1638年)八月竣工,赐额“莲华净土实胜寺”,并立满、汉、蒙、藏四体石碑以志此盛事,落成之日,皇太极亲率内外诸王、贝勒贝子、文武百官等,出怀远门,幸实胜寺,行三跪九叩大礼,并赏赐大批财物^⑥;崇德四年(1639年)正月及崇德五年(1640年)正月,又复多次驾幸实胜寺,礼佛进香,

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11,天聪六年四月乙未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 年,第 160 页。

②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33,崇德元年十一月己巳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 年,第 408 页。

③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43,崇德三年八月癸丑,第 570 页。

④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5,天聪三年二月己酉,第 70 页。

⑤ [清]杨鐔、施鸿纂修:《辽阳州志》卷 18《祠祀》,沈阳:辽沈书社,1985 年,第 742 页。

⑥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43,崇德三年八月壬寅,第 565—567 页。

赏赐有加^①；崇德八年（1643年）春，再颁谕旨，令于盛京四郊兴建永光、广慈、延寿、法轮四刹。尤其是，爱新觉罗·皇太极并不仅仅视佛教为“阴赞皇贽”之工具，而是真心期许佛教本身能够兴盛、发展，故一再强调清规戒律，要求佛门弟子严格遵守：“尔等既奉佛教，务讲明经典，洁治身心，克守清规，方为有益；若口宣佛号，身多败行，有玷清规，究何益哉！”^②“佛教本清净正直，以洁诚事之，自可获福；若不洁诚，反生罪孽。”^③“凡喇嘛班第居城外清净寺庙焚修，不许容留妇人，违者勒令还俗，其有施斋于喇嘛班第者，许令男人馈送本寺，若妇人私邀喇嘛班第到家者，以奸论罪，家人出首者，准其离主。”^④期望以行政手段，去芜存真，护持佛教健康发展。

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·福临亲政后，于顺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十一月，谕示礼部：“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，正人心必先黜邪术。儒、释、道三教并垂，皆使人为善去恶、反邪归正，遵王法而免祸患。”^⑤强调三教合一，一体并重。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秋，特诏京师海会寺憨璞性聪禅师，于万善殿结制，宣讲佛法，赐紫衣袈裟、银印、敕书及“明觉禅师”尊号；后又诏玉林通秀、木陈道忞、茆溪行森等晋京，延入宫中问道，“粤稽世祖，皈依禅宗。顺治十五年

① 详见《清太宗实录》卷45，崇德四年正月辛酉，第591页；卷50，崇德五年正月戊午，第662页。

②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34，崇德二年二月庚寅，第438页。

③ 《开国方略》卷15，转引自周叔迦编撰，苏晋仁、程恭让整理：《清代佛教史料辑稿》，第227页。

④ 《大清会典事例·刑部·礼律祭祀》卷766，转引自周叔迦编撰，苏晋仁、程恭让整理：《清代佛教史料辑稿》，第208页。

⑤ 《大清会典事例·都察院·五城》，转引自周叔迦编撰，苏晋仁、程恭让整理：《清代佛教史料辑稿》，第120页。

遣使迎僧通琇及其徒行森至京,供养西苑。顺治十六年谕:‘尔禅师通琇,临济嫡传,笑岩近裔,心源明洁,行解孤高,故于戊戌之秋,特遣皇华之使,聘来京阙,卓锡上林。朕于听览之余,亲询释梵之奥,实获我心,深契予志,洵法门之龙象、禅院之珠林者也!’恭绎纶音,尊崇备至。余如玄水杲、道忞、憨璞聪等,皆承召对,不令称臣致拜。都门宗风,自此大振。”^①顺治十七年(1660年)十二月,晋封玉林通琇禅师为“大觉普济能仁国师”,复敕设皇坛,谕玉林通琇为1500员僧伽授菩萨戒;爱新觉罗·福临亲从其受菩萨戒。世宗爱新觉罗·胤禛于其所撰《御制〈大觉普济能仁玉林琇国师语录、明道正觉茆溪森禅师语录〉序》中,将乃祖爱新觉罗·福临崇信佛法、尊礼玉林通琇茆溪行森师徒、从究心性玄奥之举,喻为上古圣王黄帝访道于广成子、成汤问道于卞随务光之美事盛轨:“我皇祖世祖章皇帝抚有方夏,万几余暇,与玉林琇、茆溪森父子,究竟心性之学,一时遇合。盖与黄帝成汤之事,无二无别,非我朝夙有崇僧之习而然也。”^②

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·玄烨,推崇程朱理学,整理儒学,不遗余力,对于佛教,最初并无好感,“自言弱龄诵读经史,未暇览金经贝叶之文”^③,中年以后则现重大转变。康熙六年(1667年),爱新觉罗·玄烨亲政伊始,便敕礼部调查全国寺院及僧道数量,总计:敕建大寺院6073座、小寺院6409座,私建大寺院8458座、小寺院

① 《清续考》卷89,转引自周叔迦编撰,苏晋仁、程恭让整理:《清代佛教史料辑稿》,第62—63页。

② [清]爱新觉罗·胤禛:《御选语录》卷11《御制序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,第449页。

③ 蒋维乔:《中国佛教史》卷4《近世之佛教·清初诸帝之信佛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89年影印本。

58682 座；僧 110292 名，道 21286 名，尼 8615 名；共计寺院 79622 座，僧尼道士 140193 名——此组数据，乃清代官方唯一一次僧道统计数据；其中，相对于寺院数量，僧道人数明显偏少（平均每座寺院仅有 1.76 名僧道）。也许，列入统计数据者，仅为持有官颁度牒者；大量私度僧道，则未被统计在内。康熙九年（1670 年）十月，颁示《圣谕十六条》，希图借此“尚德缓刑，化民成俗。”^①其中第七条“黜异端以崇正学”之“异端”，其内涵、外延，在爱新觉罗·玄烨心目中，并不十分明确，且前后不一：有以佞佛为异端者^②；有以释教为异端并以唐武宗毁佛为明断之举者^③；亦有以非孔子之说为异端者^④；复有以杨墨之学为异端者^⑤，如此等等。但在对皇子、皇孙所宣示之《庭训格言》中，则完全是另一番气象：“神佛之教，亦惟以善引人，……神佛者皆古之至人，我等礼之敬之，乃理之当然也。即今天下至大，神佛寺庙，不可胜数，何寺庙而无僧道？若以此辈皆为‘异端’，使尽还俗，不但一时不能，而许多人将何以聊其生耶！”^⑥康熙十二年（1673 年）十月初二日及十月初九日，爱新

①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 34，康熙九年十月癸巳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 年，第 10 页。

② 《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二集》卷 39，《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第 348 册，台北：世界书局，1985 年，第 710 页。

③ 《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三集》卷 34，《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第 349 册，台北：世界书局，1985 年，第 271 页。

④ 《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》卷 21，《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第 348 册，台北：世界书局，1985 年，第 202 页。

⑤ 《圣祖仁皇帝御制文四集》卷 24，《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第 349 册，台北：世界书局，1985 年，第 566 页。

⑥ [清]爱新觉罗·胤禛纂：《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717 册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 年，第 632—633 页。

觉罗·玄烨御弘德殿,由翰林院掌院学士、经筵讲官熊赐履等人进讲《论语·子路》、《论语·宪问》诸章,讲毕,召熊赐履至御前,讨论如何典学体道、正心诚意与及以孔孟之学、尧舜之道禁革陋习、转移风教、嘉与维新、化民成俗等问题,其间明确表达:“朕生来不好仙佛”;“朕十岁时,一喇嘛来朝,提起西方佛法,朕即面辟其谬,彼竟语塞。盖朕生来便厌闻此种也。”^①但另一方面,尤其自中年起,仅京畿之地,便明令敕建定慧、广通、显应、资福等等大量寺院^②;于内廷刊刻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》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、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妙法莲华经》、《入楞伽经》、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等二十二部大乘经典;遇山林学道之士,优礼有加;为皇太后六旬祝寿,进佛像三尊,御制万寿如意、万寿无疆赋等;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,封札萨克大喇嘛墨尔根绰尔济为“灌顶普惠宏善大国师”,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,封二世章嘉呼图克图阿旺洛格却丹为“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”,赐八十八两八钱八分金印一颗,并赏九龙黄褥、貂皮褥;复六下江南,五上清凉,省方观民,所到之处,无不幸寺礼佛、御书寺额碑文、题词赋诗,自称“天下有名庙宇禅林,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,约计其数,亦有千余。”^③其亲制《重修天竺碑》文云:“能仁之量,等于好生;佛道之成,关乎民隐。将使般若

① 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:《康熙朝起居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,第124—125、127页。

② 详见[清]李卫纂修:《畿辅通志》卷51《寺观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504册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。

③ [清]爱新觉罗·胤禛纂:《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717册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,第79—80页。